

第一章 张申府：中共黄埔第一人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张申府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是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早年轰轰烈烈，晚年却籍籍无名，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

张申府是黄埔军校教官中的首位中共党员，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本章仅就张申府与黄埔军校作一实证性探讨。张申府一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来回穿梭，他虽然是中共黄埔第一人，但从政治家角度衡量，他又似乎未能把握好这个角色。参加革命是儒家入世传统对世情危局的一种承担，张申府这种救世意识，是他个人意识和气质的选择，而非政治需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张申府引周恩来进黄埔，他自己却仓促离开了黄埔。黄埔军校并非他的第一选择。张申府坚持心灵解放和人性改造，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性启蒙意识。这种追求，使他对中国的社会革命始终是雾里看花。

一、“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张申府（1893—1986），字申甫，又名崧年，河北省献县人。1893年，他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918年，两人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事。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推荐当图书馆见习书记。北大毕业留校的张申府为图书馆助教，当馆长李大钊外出时，张两度主持馆务，是毛泽东的上司。他们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之一，1920年8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建



张申府

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后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4年，他们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成员。从欧洲回国的张申府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长洲岛的中共红色教官，毛泽东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并到过黄埔军校演讲，此时张申府已离开黄埔。

张申府一生中有两大转折，一是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一怒之下负气退党；二是1948年10月，一贯反对内战的张申府昧于时局，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划江而治”。这显然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略意图而受到严厉批判，不仅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连妻子刘清扬也离他而去。

刘清扬（1894—1977），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妇女

部主任、民盟中央执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1948年12月26日刘清扬便在《人民日报》



张申府全家照

上刊登离婚启事，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断绝关系。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位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从此悄无声息。

张申府曾经透露：“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毛泽东似乎仍对当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这段旧事耿耿于怀。关于这段旧事，张申年是这样回忆的：“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毛泽东后来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为了生计，张申府不得不写信给周恩来，承认自己在政

治上的“低能”，并称从此退出政治活动。张申府一而再地写检讨，后由周恩来、彭真安排，张出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以解决生活问题。想当年即1918年，张申府就是在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等参与《新青年》编委会，并于次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9年，退党多年的张申府，“从这年9月1日起我便又回到北京图书馆，恢复了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所担任的工作了”。

张申府是中国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影响社会变革的事件，仿佛都能看见张申府的影子”。^①他同时也是最早将罗素思想引进中国的学人。张申府一生总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来回穿梭，早年轰轰烈烈，晚年却籍籍无名，哑然失声，大隐于闹市之中，历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记忆。直到1976年，张申府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并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真可谓“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申府开始逐渐被关注，先后有《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思与文》、《罗素哲学译述集》、《所思》、《所忆》等书出版。研究张申府学术思想的成果主要有：张岱年《张申府哲学思想》、张岱年《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李维武《张申府先生的哲学思想》、郭一曲《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对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张申府毕竟是他那一代最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中国学者之一。

但从政治史角度探研张申府的成果仍然不多，舒衡哲的

^① 郭一曲：《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张申府访谈录》算是一本。这部访谈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访谈内容不按时间顺序作人生回放，而是将时空打乱，以迂回曲折、前后呼应的方式来印证传主的坎坷经历。此外还有一些叙述张申府政治活动的文章，这些著述对重新发现、挖掘几乎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弥补缺损的中国政治史很有意义。但是，它们对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思想和实践均论述不多，虽有提及张申府与黄埔军校及周恩来等人的关系，但仅是一笔带过，有关张在黄埔军校的研究尤为阙如。

鉴于此，本章仅就张申府与黄埔军校关系作一实证性叙述。

二、中共黄埔第一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黄埔长洲岛，又称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建苏联红军式军校，以补救以往仅是依靠和军阀结盟而没有自己军队导致的屡屡失败。

费正清曾提到：“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①如果说，善于发动工农的共产党人并不缺乏组织工会和农民运动的人才，并成功地占据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届主任一职的话，那么，中共则缺乏搞军事武装的人才。在筹办和建校初期，中

① [美] 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页。

共“安插”进黄埔军校任教官的除张申府外并没有第二人。反之，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深谙“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他紧抓住黄埔，将黄埔发展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力中心。那么，中共党员张申府是怎样进入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军校，并在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呢？

张申府并非一般的中共党员，他是中共创建人之一。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讲授数学逻辑并兼北大图书馆助教时，陈独秀恰好经沈尹默推荐任北大文科学长，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代章行严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一年，志趣相投的陈、李、张经常在红楼李大钊办公室聚会，李、张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委，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不少新锐文章。早期旅欧少年共产党党员郑超麟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次年，即1918年12月，陈、李、张又联手创办《每周评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每周评论》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重要。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维金斯基来华，先后会见李大钊、张申府和陈独秀等，密商中国建党一事。1920年5月，在上海的陈独秀致长函张申府，商议组织政党事宜，并就组织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的意见。他在信中特别叮嘱张申府：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据张申府回忆：“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①“南陈北李”加上中间联系人张申府，三人开始酝酿发展中

^①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国共产党党员之事。

张申府回忆说：“陈独秀热情很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①要发展的第一个人是刘清扬。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是天津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骨干。张申府说：

9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②

张的这段叙述颇有点“守常老大吾老二”之意味。

同年冬，张申府受聘于巴黎里昂大学中法学院（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筹办）教授逻辑学，他以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身份随蔡元培一同赴法国。行前他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商议建党一事，这也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地。当张申府抵达巴黎时，已肩负着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使命，张申府成了欧洲中国青年学生群中政治和思想成长的催生者。1921年，

①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②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旅欧时期张申府（前排左一）与朱德（前排右一）等同学

张申府在巴黎创立中国留法学生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从张申府 1922 年的日记来看，当时张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经常彼此交换有关建党情况的意见。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张申府收到会议通知。张申府在小组里讨论后，“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1923 年年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李大钊认为广东形势很好，亲自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1924 年春节后，张从北京启程赴粤，经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面，陈支持张申府去广州工作。张抵达广州，适逢国民党改组，因有李大钊（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推荐信，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无几，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元帥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农工部长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思想敏锐而又喜好新事物的张申府，甫到广州就在这块



黄埔军校

革命热土上活跃起来。正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2月6日，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南堤二号（今沿江路239号）正式成立，蒋介石离开广州时由廖仲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人说英语和德语。通晓英、德语的张申府很快加入进来，后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员。

张、蒋认识并非始于黄埔，“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① 他们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虽然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但也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这次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使蒋介石兴奋不已。这次的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

①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军校的机缘之一。

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出身的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内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语），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心存戒心，但公开场合却以高姿态赞成“联俄”并接受“容共”。羽翼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力量，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熊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秘密培训军事人才的对象，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熊雄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派来的陪同，蒋、熊由此结识。熊雄后回国入黄埔，很快被蒋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这是后话。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黄埔军校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秘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聘，其中最积极者为毛泽东、徐特立、于右任、戴季陶、居觉生等。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书科主任，负责黄埔生在上海的考试，上海考生中有徐向前、胡宗南、桂永清、黄维等。1924年3月27日，经过各地考试合格后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参加复试，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州文明路）礼堂为考场，国文试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人物。

张申府显然得到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这批由蒋介石提名的十七位人选当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军衔少校），主任是国

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浚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军校教官主要来源于日本军事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军官，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第一人，时年32岁。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偶然，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

孙中山建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要有主义信仰，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作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①“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

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想法，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蒋曾仔细考察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写道：

（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红军的组织。军中政治则由党代表负责。我研究了军中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示范。我发现红军陆军第144团的团长只负责军事指挥。政治与精神教育及一般知识性的教育概由党代表负责。军官与党代表权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责分明，此种制度十分成功。^①

它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介石认为中国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军事与政治并重，这在中国军校史上前所未有。

虽然政治教育十分重要，但苏联顾问不涉及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这是不得已的策略。当时英美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报刊出于对苏维埃的恐惧，把黄埔军称为“赤军”，他们认为，在俄国顾问的控制下，黄埔军校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为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赤化”，苏联顾问一般只负责军事训练事宜。^②而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理论方针，加上本身也没什么政治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定了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担任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三、军校政治部与引荐周恩来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国共两党的“跨党”成员，但张申府则明确说他只“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反而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建校初期的政治部尚未成型，更谈不上正规化。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确实是个新鲜事物，在长达四个月的

^① 陈洁如著，汪凌石译：《陈洁如回忆录》，台北新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5页。

^② [苏]亚·伊·切列潘若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1部），“国防部”史政局1975年版，第92页。

军校筹建时期并没有设立政治部，只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五部，国民党对军队组织的建构还停留在旧式军校的传统观念上。政治部建制是在6月军校正式成立时才仓促推出，但很快被视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从人员来源看，政治部不可谓不重要，颁布政治部正副主任人选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委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本校政治部遂告成立”。^①

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元冲都是国民党大员，公务缠身，难以躬亲黄埔长洲岛，更不用说负“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责任。张申府是当时唯一同时在孙中山“一武”（黄埔军校）“一文”（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两所学校担任教职的人。岭南大学毕业的政治部秘书甘乃光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更是代理国民党中央实业部部长，身兼数职，同样难以坐稳黄埔岛。可见，刚成立的政治部架子很大却是空的，日常工作只由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承担。负责处理军校日常事务的党务委员之一戴季陶，开学以来仅来校两次。军校内也少见张申府的身影。按照军校“权责”规定，政治部主任“掌理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副主任有辅助主任整理执行本部一切工作之权”。^② 由于学校军阶分明，少校级的副主任不能逾越少将级主任之责。主任不作为，副主任也难以有所为。加上军校初办时期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黄埔军校史稿》（第7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②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常的政治课，黄埔军校早期学生的政治训练质量都不高。

据黄埔一期生蒋超雄回忆：当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他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那么，如何给学生上政治课？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星期演讲”，除本校教员外，演讲者大多数是党部和政府名人，先后来学校演讲的有：

谭延闿：《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

李济深：《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李烈钧：《中国革命战争略史》

甘乃光：《本党的阶级基础》

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

宋子文：《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

孙 科：《肃清吏治问题》

陈克文：《本党农民运动概况》

罗绮园：《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

陈果夫：《本党组织概要》

彭泽民：《华侨与革命运动》

彭 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

.....①

这些演讲，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成为政治部工作的一大特色。戴、张不常来校，甚至后来离校“跑了”，政治部“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②

张申府虽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个人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而是在于他利

① 《官长政治教育计划》，《黄埔日刊》1926年11月19日。

② 《初期政治部主任之更迭》，《黄埔潮》1925年第24期。

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引进黄埔。这要从张申府写的一封推荐信说起，信的内容和后果对中共日后在黄埔的发展非同小可，他这样说：

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①

在张申府眼里，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戴季陶甚至是早期中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戴季陶（1891—1949），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五四运动时期与沈定一等在上海主办《星期评论》。张申府和李大钊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时，戴季陶一度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并有过相当的研究，但因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终未加入共产党。张申府和戴季陶并不陌生。张申府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廖、戴，信上列有15人名单，均为共产党人，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张申府与周恩来早年便已结识：

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

^①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①

这一年，在北大当教师的张申府27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回国不久的周恩来22岁。同年冬，张申府到巴黎后，见到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聊，互相尊重，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张申府看来，周恩来是一位才华出众且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张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经济困难，希望能寄上路费。张

旅欧时期的张申府（左一）与周恩来（右二）、刘清扬（左二）

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当时政府财政拮据，军阀杨希闵把持广东财政，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廖仲恺不得不“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尽管如此，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但实情是，周恩来没有收到这笔路费。

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时廖仲恺也汇路费给在美国哥伦比

^① 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旅欧时期的张申府（右一）和周恩来（左二）等

亚大学就读的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公费留学生陈公博，让他尽快回国。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06年加入兴中会，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脱离共产党，次年2月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不同的是，陈公博的“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①回国后的陈公博还没进广东大学，就被廖仲恺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后又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务。显然，廖仲恺十分看重张申府推荐的人才。

在此之前，由李济深引进黄埔的邓演达也很关心推荐名单一事，张申府与“如同老友”的邓演达“每次谈话，他（指邓演达——引者注）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②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

①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